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大學生知覺父母權威性與其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Parental Authority, Anger Process and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doi:10.6251/BEP.20001112

教育心理學報, 32(2), 2001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2(2), 2001

作者/Author：程秀蘭(Hsiu-Lan Cheng);林世華(Sieh-Hwa Lin);吳麗娟(Li-Chuan Wu)

頁數/Page：19-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1/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251/BEP.2000111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系  
教育心理學報，民90，32卷，2期，19—44頁

# 大學生知覺父母權威性與其生氣歷程、 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

程 秀 蘭

林 世 華

吳 麗 娟

台北市  
明德國民中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本研究包含兩個子研究，「研究一」旨在探討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憂鬱傾向的關係；「研究二」旨在考驗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徑路模式。本研究以大台北地區九所公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之大一到大三學生為研究對象，共計765名，並隨機分為兩個子樣本供「研究一」及「研究二」之用，分別為360人、405人。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研究工具包括「父母權威性量表」、「李氏生氣歷程量表」、「貝克氏憂鬱量表」。「研究一」將第一個子樣本調查所得的資料，以典型相關分析、同時多元迴歸分析、階層式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處理，探討各研究變項之相關情形。本研究再以「研究一」所得結果為基礎，並參考相關文獻，提出「大學生知覺父母權威性與其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徑路模式」，進而以第二個子樣本進行「研究二」的徑路模式考驗。本研究發現：1.大學生知覺母親愈專制權威、父親愈專制權威，而且母親愈不縱容溺愛和愈不開明權威及父親愈不開明權威時，則大學生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和生氣激起狀態愈高。2.當其它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大學生知覺母親愈專制權威或母親愈縱容溺愛，則大學生的憂鬱傾向愈高；而其它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時，大學生知覺父親愈縱容溺愛，則大學生的憂鬱傾向愈低。3.大學生生氣歷程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憂鬱傾向。4.本研究提出的「大學生知覺父母權威性與其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徑路模式」可被接受用來說明本研究各變項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大學生、父母權威性、生氣歷程、教養方式、憂鬱傾向

生氣是個體日常生活中最常經驗到的情緒之一。多數人每天或每週在某些地方會經驗到輕度至重度的生氣，且和許多人際問題有關；生氣常發生於重要的人際關係之間，人們通常對認識的、重要的、在乎的、喜歡的人生氣（Averill, 1982；Fitz & Gerstenzang, 1978）。生氣可以說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情緒經驗，和個體的生活息息相關。而家庭是個體最早觀察和經驗生氣的社會互動情境（Burrowes & Halberstadt, 1987），父母是個體最早接觸和互動的重要他人。父母從小對子女的教養方式會影響子女的情緒發展、情緒經驗和情緒感受及表達，其中包括了生氣情緒的體驗與表達（李雪禎，民85）。

\* 本論文係程秀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完成之碩士論文的部分內容，由吳麗娟教授、林世華教授共同指導。

教養方式和子女的身心適應的關係，長久以來備受關注。我國的教養觀深受傳統農業社會中家庭主義和權威主義的影響，家庭提供家人彼此無條件的支持，但似乎也意味著每個人需接受無條件的控制；中國家庭的支持與控制可以說是一體之兩面。父母對子女的控制和權威被視為天經地義，其權力來源亦不容許被挑戰（余德慧，民76）。管教權威的運用，似乎在我國的教養觀中扮演了相當特殊的角色。父母運用權威來管教子女的適當性如何，及其與子女各項適應的關係值得加以探討。父母對子女的權威管教方式可能影響著子女的成長及發展；當父母採取不同的管教方式和子女互動時，可能引發子女不同的情緒經驗。對子女而言，父母是其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他人，親子之間在日常生活的相處裡自然會伴隨情緒的引發、情緒的經驗與表達等。我國固有文化重視「孝道」，強調子女對父母的順從與體諒，有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余德慧、林麗雲等，民80）；子女對父母應該要和顏悅色，即使子女對父母有負面的情緒，例如生氣，可能也要「不形於色」、「不慍不怒」。因此，子女在對父母的生氣體驗及生氣表達上可能存在著複雜的內在歷程。早期心理分析學者認為，導致憂鬱的某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長期將生氣指向自己、對自己生氣，或是壓抑生氣的結果（Alexander & French, 1948；Freud, 1917, 1957；引自Clay, Anderson & Dixon, 1993）。在我國傳統文化注重孝道及父母權威管教的價值體系下，子女如何經驗、如何處理其對父母的生氣情緒，這些和心理健康的關係如何等，似乎更需加以探討。因此，進一步詳加探討子女知覺的父母權威性如何影響到子女的生氣歷程、透過何種途徑影響到子女的心理健康等，實屬重要。

過去許多文獻一致地指出，父母的嚴厲管教、高要求、高控制的專制權威和子女的生氣經驗有關係。例如：李雪禎（民85）分析國中青少年情緒經驗與父母教養方式指出，父親採專制權威方式的青少年比父親採開明權威的青少年有更多的生氣情緒；母親採專制權威方式的青少年也比母親採開明權威的青少年有更多的生氣情緒。Markosian（1996）的研究也指出溫暖且彈性的開明權威方式和支持性的親子關係最有相關，且子女較不會經歷到生氣和怨恨。Metcalf與Gaier（1987）的研究指出受到父母高壓管教的子女有較多的生氣、怨恨和反抗行為。然而，這些研究多僅就一般的情緒經驗做探討，並未針對生氣做獨立的探究，也未考慮生氣現象的多重面向（例如生氣的情境、頻率、生氣的強度與生氣的表達方式等）和父母權威性的關係；且開明權威和縱容溺愛的父母權威性與子女的生氣經驗之關係也較少被探討。不少學者指出，針對不同的生氣對象或事件，個體可能會有不同的生氣經驗與生氣表達（李瑞玲，民82；Averill, 1982；Shaver, Schwartz, Kirson & O'Conner, 1987），研究生氣變項時最好能涵蓋生氣的情境變項和生氣的激起經驗與表達方式（李瑞玲，民82；Sharkin, 1988）。鑑於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不同的父母權威性和生氣之間的關係，並採取李瑞玲（民82）所提出的生氣歷程的觀點，以期能更完整地探究父母權威性與生氣情境因素、生氣激起和生氣表達的關係之內涵。

在子女知覺父母權威性與子女憂鬱傾向的相關研究方面，過去文獻顯示：子女若知覺父母常是嚴厲的、懲罰的、高要求的、高權威支配的、心理控制和干涉的，則子女的憂鬱傾向愈高；然而，子女知覺父母之縱容或過度保護與子女憂鬱傾向的關係之研究結果則不一致。例如：李雪禎（民85）將憂鬱（depression）歸於悲傷（sadness）情緒中的不同層次。其研究結果指出，知覺父親採專制權威的教養方式之青少年會比父親採開明權威及寬鬆放任之教養方式有更多難過、傷心的情緒；知覺母親採專制權威的教養方式之青少年比母親採開明權威及寬鬆放任的教養方式有更多的憂傷情緒。Oliver與Paull（1991）的研究指出，大學生所知覺的父母行為愈是高要求的、控制的、專制的、懲罰的，則大學生的憂鬱程度愈高。Lamont與Gottlieb（1975）的研究顯示，父親的不關愛、專制權威等和大學生的憂鬱有相關。Fox、Bronstein與Knolls（1997）的研究指出，青少年所知覺的父母之早期或目前的教養行為若是屬於支持的、關心的、有回應的、接納其情緒並加以引導的，則晚期青少年較不會有憂鬱。Fox、Bronstein與Knolls（1997）、Straus與Donnelly（1994）、Curtner（1995）的研究也顯示，青少年所知覺的父母教養行為若是屬於懲罰的、要求的、限制的，則和青少年的憂鬱有高的正相關。

Parker (1979, 1981, 1982) 的研究則一致地發現，母親和父親的低關懷、母親（但不是父親）的過度保護 (overprotective) 和成人的憂鬱有正相關。Raskin、Boothe、Reating、Schulterbrandt 與 Odel (1971) 的研究發現，憂鬱患者知覺其父親和母親較少是採用正向參與 (positive involved) 的教養策略、較傾向於採用負向和處罰的教養策略。此外，這些病人知覺其母親是過度縱容 (overpermissive) 而不是過度保護的，此一發現和 Parker (1979, 1981, 1982) 的研究結果相反。這些不一致的研究結果顯示子女知覺父母權威性和其憂鬱傾向的關係有待更進一步的探討。

在生氣歷程與憂鬱傾向的相關研究方面，過去許多探討生氣與憂鬱的相關研究指出向內生氣和憂鬱有正相關存在。例如：Biaggio 與 Godwin (1987)、Moore 與 Paolillo (1984) 發現，愈常將生氣向內指向自己，則憂鬱程度也愈高。Riley、Treiber 與 Woods (1989) 的研究也指出，憂鬱傾向的人經驗到較多的生氣，並且似乎較會採取壓抑生氣的方式，或把生氣轉向自己，而不是把它向外表達出來。Clay、Anderson 與 Dixon (1993) 對大學生的研究指出，向內生氣 (anger directed inward) 是預測憂鬱的一個重要因素。Stehouwer、Bultsma 與 Blackford (1985) 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和成人患者的共同主題是，對自己生氣 (anger at self) 和失敗感。Mckenzie (1997) 也發現生氣和憂鬱之間的確存有顯著的正相關。Thomas 與 Williams (1990) 的研究結果指出，「特質生氣」 (trait-anger) 對健康而言，並沒有像受到壓力事件激發後所採取的生氣表達方式來的重要。雖然上述的研究大多指出，向內生氣和憂鬱之間存有正相關，然而，也有研究發現兩者之間並沒有顯著相關存在。例如，Kessel 與 Chrisler (1991)、許靜怡 (民 85) 的研究則指出，向內生氣並未直接導致憂鬱，而是透過個體的認知中介歷程。甚至有相反的發現，例如，Johnson 與 Bronman (1987) 在一個針對美國黑人的全國性樣本所做的研究裡則發現向外表達生氣和健康有負相關。由此可見，生氣和憂鬱是否有相關存在，向內生氣是不是導致憂鬱的原因之一，在目前的文獻和研究中並未獲得一致性的結果，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與釐清。

目前的實徵研究缺乏直接探討父母權威性與子女的生氣歷程及憂鬱傾向三變項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或影響徑路。然而，一些實務工作者從實際輔導案主的過程中指出其間可能存有因果途徑。Grusec 與 Goodnow (1994) 指出，早期心理分析學者認為，父母對小孩的紀律訓練 (discipline) 過程中，小孩從父母處所受到的挫折導致小孩感到生氣和敵意，然而，這些生氣和敵意是被壓抑的，因為小孩害怕若把這些生氣和敵意表現出來將會受到父母的處罰，特別是父母可能不再愛他或遺棄他。如此，小孩的依賴需求可能未獲父母的充分滿足而感到更多的生氣和憤怒 (Saul, 1939；引自李瑞玲，民 82)，父母未能提供給子女客體的滿足，對於客體的失落所感到的生氣因而長期地導向自己，這是造成憂鬱的原因 (Rie, 1966)。Teyber (1997) 也認為，孩子若處於父母的嚴格要求、高批評與處罰的專制權威之下，其在開始時可能會對此感到生氣並提出抗議，然而，專制權威的父母常不允許孩子有異議且要求絕對服從。父母可能常以恐嚇、威脅、處罰，甚至以撤回關愛或引發罪惡感的方式來要求小孩服從權威。長期下來，孩子可能覺得是自己不好所以才導致父母的處罰，並且可能覺得自己不應該對父母有生氣的情緒，子女可能會壓抑對父母的生氣或將生氣轉向自己，自貶、自責，如此也容易有憂鬱傾向。Sharkin (1988) 則指出，導致案主前來尋求協助的許多問題核心可能都和生氣情緒有關，也可能源於和重要他人之間的生氣困擾。

研究者過去在實際輔導大學生的經驗中也發現，許多前來求助的大學生其問題多根源於家庭，尤其是對父母常充滿著矛盾的情緒。大學生一方面對父母於成長過程中所給予的撫育和照顧存著感激，但另一方面卻也常感到父母的過度要求與控制，令其在大學追求獨立自主的生活時感到困擾和衝突。在大學生對父母的種種情緒中，「生氣」似乎是讓大學生很難去承認、去經驗和處理的；在生氣父母的同時也常感到罪惡感或羞愧，覺得不應該生父母的氣。大學生似乎會覺得對父母生氣意味著不感激、不體諒父母，甚至是「不孝的」，難以面對內心對父母的生氣情緒。然而，對父母生氣情緒的底

層，其實似乎常存著子女對父母最根本的心理需求：渴望被愛、被瞭解、被肯定、被欣賞。這許多「未了」的生氣情緒通常深藏於不易窺見的意識底層，而顯現於諮商中的是目前的人際問題、憂鬱沮喪或身心症狀等。雖然研究者在諮商實務工作上觀察到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所知覺到的父母權威管教方式似乎和其在經驗對父母的生氣上存有密切關係，也和其身心適應有關，但針對此一現象的實徵研究卻付諸闕如。

有鑑於此，本研究乃欲以此為研究主題，進一步瞭解大學生知覺父母權威性與其生氣歷程和憂鬱傾向之間的關係內涵及影響途徑，期待能提供親職教育和諮商輔導實務工作的參考。研究者在詳細探討過去文獻時亦發現，過去學者大多著重在父母的專制權威對子女的生氣和憂鬱可能的影響之探討，至於開明權威、縱容溺愛等教養方式對子女的生氣和憂鬱傾向的影響途徑如何是較少被提及的。此外，學者大致都聚焦於父母權威和壓抑生氣及憂鬱之間的關係，較少探究生氣的其他內涵（諸如生氣情境發生的頻率、生氣激起的程度及其他的生氣表達方式等）在這些可能的影響途徑上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不同的父母權威性可能使子女置身於不同的生氣情境頻率中，而有不同的生氣激起狀態和生氣表達方式，進而影響了子女的憂鬱傾向。因此，本研究乃欲更完整地探討子女所知覺的不同父母權威性和子女的生氣歷程及憂鬱傾向之間的影响途徑，並探求徑路模式存在的可能性，以期能對親職教育及諮商輔導實務提供更具體的參考方向及建議。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以下進一步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及重要名詞之釋義。

### 一、研究目的：

(一)探討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憂鬱傾向的關係內涵。(二)探討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徑路模式。(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未來相關研究、親職教育及諮商輔導實務的參考。

### 二、研究問題：

(一)探討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憂鬱傾向的關係內涵。亦即，大學生所知覺的父母權威性和大學生生氣歷程有何關係存在？大學生所知覺的父母權威性是否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大學生的生氣歷程是否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的憂鬱傾向？

(二)探討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徑路模式。亦即，大學生所知覺的父母權威性、生氣歷程與憂鬱傾向之間的徑路模式為何？此一徑路模式是否可以有效解釋大學生所知覺的父母權威性、生氣歷程與憂鬱傾向之間的互動關係？

### 三、名詞釋義：

#### (一)父母權威性 (parental authority)

父母權威性指父親、或母親在教養子女時，其所使用的權威是屬於「專制權威」、「開明權威」，或「縱容溺愛」(Baumrind, 1971)。本研究所使用的父、母權威性的評量，是以受試者在「父母權威性量表」上的父親權威性分量表、母親權威性分量表上，屬於「專制權威」、「開明權威」，或「縱容溺愛」题目的得分表示。共可得到父親的「專制權威」、「開明權威」、「縱容溺愛」分數；以及母親的「專制權威」、「開明權威」、「縱容溺愛」分數。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知覺父親或母親愈傾向於此種權威性。以下分別說明三種父母權威性：

1.縱容溺愛 (permissive)：指父母對於子女的衝動、欲求和行動等，採取一種接納的、肯定的和不處罰的方式。父母對子女很少有要求，不對子女作約束，並且幾乎容許子女的任何行爲，也幾乎不處罰子女。

2. **專制權威 (authoritarian)**：指父母常以一套行為的標準，且通常是絕對的單一標準來塑造、控制和評價子女的行為及態度。父母傾向於要求子女完全服從，否則就予以處罰並限制其自主性，不鼓勵意見的溝通；相信子女應該要接受父母認為是對的事情。

3. **開明權威 (authoritative)**：指父母會對子女予以要求和規範，重視遵守紀律並指導子女的活動，但是在合理的範圍內，會和子女溝通要求和規範背後的理由，重視與子女之間的意見交流，也會視子女的個別差異來調整要求；肯定子女的獨特性和自主性。

### (二) 生氣歷程

生氣歷程包括了：「生氣的前置情境」(情境、頻率)、其引發個體的「生氣激起的狀態」(頻率、強度、持續度)及「生氣表達的方式」(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把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控制生氣)(李瑞玲, 民82)。

本研究之「生氣歷程」指：「李氏生氣歷程量表」中，大學生生氣前置情境量表之「父母亂批評我」因素分量表的四大生氣前置情境在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發生的頻率、此四大情境下所引發大學生生氣激起的狀態，及此四大生氣情境下大學生的生氣表達方式。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生氣歷程中的各名詞：

1. **大學生生氣前置情境頻率**：本研究將大學生的生氣前置情境界定在和父母有關的情境，即「李氏生氣歷程量表」的「父母亂批評我」因素分量表之四大情境。以「父母亂批評我」因素分量表來測量這四大生氣前置情境在大學生日常生活中發生的頻率。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李氏生氣歷程量表」只以原量表中的「父母亂批評我」因素分量表來評量大學生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受試者在本研究之「李氏生氣歷程量表」上「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的得分愈高，表示此情境在受試者日常生活中發生的機會愈高。

2. **大學生生氣激起狀態**：李瑞玲(民82)指出，由於引起受試者感到生氣的頻率和生氣前置情境頻率息息相關，故單一的生氣激起可以由當時的強度和持續度來決定，但長期的生氣激起狀態則必須考慮上述兩種頻率，如此方能估計生氣激起的累積性。因此，生氣激起狀態是指「生氣前置情境頻率」乘以「生氣頻率」，再乘以「生氣強度」與「生氣持續度」的和，即： $(\text{生氣前置情境頻率}) \times (\text{生氣頻率}) \times (\text{生氣強度} + \text{生氣持續度})$ 。本研究中的生氣激起狀態指：受試者在「父母亂批評我」四大生氣情境頻率题目的得分乘以此情境下受試者感到生氣之頻率题目的得分，再乘以生氣強度題目與生氣持續度題目得分之和，作為「生氣激起狀態的指標」。乘積愈高表示受試者的生氣激起狀態愈高。

3. **大學生生氣表達方式**：本研究之生氣表達方式指大學生受試者在面對「父母亂批評我」四大生氣情境時，其所採用的生氣表達方式，共有「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把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控制生氣」五種。受試者在每一種生氣表達方式题目的得分愈高表示其愈傾向於此種生氣表達方式，得分愈低表示愈不是採用此種生氣表達方式。

### (三) 憂鬱傾向

Beck (1987) 認為憂鬱程度高的人常為自己擬定嚴格的、完美的、且根本不可能達到的目標，他們的負向期待太強，思考集中在某些重要的損失上，以致於導致悲傷、失望與冷漠的情緒狀態；常有悲觀、失敗感、自我責難、易怒、社交退卻、不適的身體症狀等(引自 Corey, 1991)。本研究中的憂鬱程度是指在「貝克憂鬱量表」的得分，得分愈高表示其憂鬱程度愈高。

## 方 法

###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基於研究動機與目的，旨在探討本研究各變項之間的關係，並希望藉由對各變項之間關係

的瞭解，提出一個可以解釋各變項的互動關係和因果徑路之理論模式，進而對研究者所提出的此一模式加以考驗，故本研究分為「研究一」和「研究二」兩部分進行。

「研究一」旨在探討本研究中各研究變項的相關情形，即，探討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大學生生氣歷程、大學生憂鬱傾向各變項之間的兩兩相關情形。「研究二」旨在探究一個可以解釋本研究各變項的因果關係和影響徑路的理論模式。「研究二」是以「研究一」對本研究各變項間的兩兩關係之瞭解的研究結果為基礎，並參考文獻，提出本研究所主張的因果模式，進而以另一個子樣本來考驗此模式的準確度。換言之，研究二的目的是考驗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和憂鬱傾向之間的徑路模式。

本研究之兩個子研究在所探討的研究變項和所使用的量表工具方面皆相同，所不同的是，兩個研究所欲回答的研究問題不同，其各自的目的也不一樣。然而，兩個子研究的共同目的皆是欲增進對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和大學生生氣歷程及憂鬱傾向各變項的關係及影響徑路之瞭解，因此，兩個子研究在本研究最終目的上是一貫的。

##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大台北地區（台北縣、市）的九所公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之大一到大三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沒有以大四學生為研究對象，乃因考慮到大四學生畢業在即，修課較少，且必須面臨畢業後的生涯問題（諸如，考研究所、出國唸書、就業、服兵役等），對於問卷的填答可能較容易感厭煩或不專心作答，不易取得其合作。因此，本研究只以大一到大三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以叢集抽樣法的方式進行抽樣，盡量涵蓋不同學校及不同院系之學生。本研究共發出量表883份，量表之施測及發放與回收皆由研究者或由經過訓練的施測者到班級實施。待回收受試者填寫完之量表後，剔除父母婚姻不完整、填答不完全、有明顯反應心向之間卷，最後得到有效樣本共765人。

本研究基於研究設計包括「研究一」和「研究二」兩部分，因此，本研究將所得的全數有效樣本765人，以電腦SPSS for Windows 9.0套裝程式，將全樣本再隨機取樣為兩個子樣本。以樣本一（360人）進行「研究一」的研究，即瞭解三個研究變項之兩兩關係。之後，研究者再根據文獻探討及「研究一」所得的研究結果，提出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其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間的徑路模型，並以樣本二（405人）進行「研究二」的統計分析及考驗。樣本一（360人）及樣本二（405人）在人數上的差異完全是電腦隨機取樣的結果。

「研究一」及「研究二」樣本的人數、性別、年級分配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 「研究一」及「研究二」樣本之人數、性別、年級分配表

	研究一 (樣本一) 人數	研究二 (樣本二) 人數
性別：		
男生	143	166
女生	217	239
年級：		
一年級	98	98
二年級	128	145
三年級	134	162
總人數：	360	405

### 三、研究工具

#### (一)父母權威性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的「父母權威性量表」乃根據Buri (1991) 依Baumrind (1971) 所提出的三種父母權威性(專制權威、開明權威、縱容溺愛)所編製的Parental Authority Questionnaire (PAQ)所修訂而成的,共計58題,分為母親、父親兩部分給受試者填答,每部分各有29題。其中,屬於「母親縱容溺愛」、「父親縱容溺愛」的題目各9題,屬於「母親專制權威」、「母親開明權威」、「父親專制權威」、「父親開明權威」的題數各均為10題。本量表在母親縱容溺愛、母親專制權威、母親開明權威的Cronbach  $\alpha$ 係數分別為:.70, .83, .86;在父親縱容溺愛、父親專制權威、父親開明權威的Cronbach  $\alpha$ 係數分別為:.74, .86, .87。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另外,本研究以LISREL8.30版統計軟體,對本量表的建構效度進行驗證式因素分析,其中,母親分量表之縱容溺愛、專制權威、開明權威之因素負荷量分別介於.10至.68, .38至.71, .37至.77之間;父親分量表之縱容溺愛、專制權威、開明權威之因素負荷量分別介於.09至.70, .40至.73, .32至.75之間。

所有項目的因素負荷量皆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 (二)李氏生氣歷程量表

本研究基於研究性質主要在探討:大學生在面對和父母有關的生氣情境中,其生氣歷程是否與大學生所知覺的父母權威性有關,故只選用原「李氏生氣歷程量表」(李瑞玲,民82)中,大學生生氣前置情境量表的「父母亂批評我」之生氣前置因素題目。因此,本研究所使用之「李氏生氣歷程量表」乃包括李瑞玲(民82)所編的「李氏生氣歷程量表」中,大學生生氣前置情境量表的「父母亂批評我」因素分量表,及「大學生生氣激起狀態量表」、「大學生生氣表達量表」組合而成;用以評量大學生在面對「父母亂批評我」情境時,其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生氣表達方式,以瞭解大學生在面對「父母亂批評我」前置情境時的生氣歷程。由於「李氏生氣歷程量表」是採用題組型的題目呈現方式,和一般的量表題目呈現方式較不相同,所以以下將針對構成其題組的三大部分,即大學生生氣前置情境量表的「父母亂批評我」因素分量表、「大學生生氣激起狀態量表」和「大學生生氣表達量表」作進一步介紹。

在「父母亂批評我」因素分量表方面,共包括四大生氣前置情境,分別為「當父母誤解我,不分青紅皂白責備我時」、「當父母意見和我不同,又一再嘮叨干涉我時」、「當我自認為把事情做的很好,父母不但不認可稱許,反而一直批評我時」、「當父母在家人或親友面前教訓或數落我時」。在「大學生生氣激起狀態量表」方面,共有四大題目,分別測量上述「父母亂批評我」因素分量表的四大生氣前置情境近年來發生的頻率、上述生氣前置情境受試者感到生氣的頻率、上述生氣前置情境受試者感到生氣的程度,及上述前置情境下受試者生氣的持續時間。在「大學生生氣表達量表」方面,分為五種生氣表達方式,即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把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和控制生氣。針對每種生氣表達方式的內容,是採用附表說明並舉例的方式,讓受試者填答時參考,再選出其在上列的生氣前置情境下採用各種生氣表達方式的情形。以下舉一「李氏生氣歷程量表」的題組為例(表二),及「李氏生氣歷程量表附表:生氣表達方式」(表三),使讀者能清楚了解本研究工具的內涵。





表二 「李氏生氣歷程量表」題組舉例

一、當父母誤解我，不分青紅皂白責備我時，

1.上述情況近年來

(1)極少發生	(2)有時發生
(3)經常發生	(4)總是發生

2.上述情況

(1)我極少感到生氣	(2)我偶爾會感到生氣
(3)我經常會感到生氣	(4)我每次都感到生氣

3.上述情況我生氣的程度通常是

(1)幾乎不生氣	(2)有點生氣
(3)頗為生氣	(4)非常生氣

4.上述情況我生氣的時間通常持續（有7個選項，作答時請小心勾選）

- (1)740分以下（約12小時）
- (2)740分至1700分（約1天4小時）
- (3)1700分至2500分（約1天18小時）
- (4)2500分至3300分（約2天7小時）
- (5)3300分至4200分（約2天22小時）
- (6)4200分至5000分（約3天11小時）
- (7)5000分以上

上述的情況當你感覺生氣時，對以下的生氣情緒反應，如果你幾乎沒有這種反應，就在答案卡上塗滿選項1----代表“極少如此”。如果你有時會這樣反應，就塗滿2----代表“有時如此”，如果你常常會這樣反應，就塗滿3----代表“經常如此”，如果你總是這樣反應，就塗滿4----代表“總是如此”。

5.以語言表達生氣（VO）：（意義請見附表）

(1)極少如此	(2)有時如此	(3)經常如此	(4)總是如此
---------	---------	---------	---------

6.以動作表達生氣（AO）：（意義請見附表）

(1)極少如此	(2)有時如此	(3)經常如此	(4)總是如此
---------	---------	---------	---------

7.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IO）：（意義請見附表）

(1)極少如此	(2)有時如此	(3)經常如此	(4)總是如此
---------	---------	---------	---------

8.把生氣放在內心不表達出來（AI）：（意義請見附表）

(1)極少如此	(2)有時如此	(3)經常如此	(4)總是如此
---------	---------	---------	---------

9.控制生氣（CO）：（意義請見附表）

(1)極少如此	(2)有時如此	(3)經常如此	(4)總是如此
---------	---------	---------	---------

註：引自李瑞玲，民82



表三 李氏生氣歷程量表附表：生氣表達方式

<p>1. 以語言表達生氣 (VO) :</p> <p>如：向當事人表示生氣。 與當事人爭執。 對當事人發脾氣</p>
<p>2. 以動作表達生氣 (AO) :</p> <p>如：當場砰然摔門或摔東西 在當事人背後摔東西、摔門。 在當事人背後踢東西、或踢門、踢牆壁。</p>
<p>3. 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 (IO) :</p> <p>如：背著當事人對別人批評或諷刺當事人。 在眾人面前 (含當事人在內) 指桑罵槐。 自己在心中咒罵或自言自語罵三字經。 公開在當事人面前以其他事情唱反調或不合作。 在當事人背後暗地裡與當事人唱反調或不合作。 在眾人面前 (不含當事人在內) 指桑罵槐。 遷怒他人或把氣出在其他人 (非當事人) 身上。 向當事人以外的人抱怨、訴苦或發牢騷來宣洩生氣。</p>
<p>4. 把生氣放在內心不表達出來 (AI) :</p> <p>如：將生氣藏在心理。 繃著臉或是悶悶不樂地。 退縮離開人群。 怒火中燒。 生氣的程度比自己願意承認的還多。 生氣的程度比別人觀察到的還多。 幾乎無法控制生氣。 在當事人面前以不講話或其他消極方式間接表達生氣。</p>
<p>5. 控制生氣 (CO) :</p> <p>如：控制我的生氣。 保持冷靜。 以恭順或笑容掩飾內心的生氣。 表面若無其事地走開。 很快冷靜下來。 平和地向當事人表達我的看法。</p>

註：引自李瑞玲，民82



在信效度方面，「父母亂批評我」因素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alpha$  為.86，再測信度係數為.84。「大學生生氣表達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alpha$  為.86，隔二週之再測信度為.83。至於各生氣表達方式因素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Cronbach  $\alpha$  分佈在.81到.83之間，再測信度係數則分佈在.80到.86之間。在「大學生生氣激起狀態量表」方面，生氣激起狀態的四個向度「日常發生頻率」、「生氣頻率」、「生氣強度」、「生氣持續度」，其內部一致性Cronbach  $\alpha$  值為.83，再測穩定係數為.81。

### (三)貝克氏憂鬱量表

本研究採用柯慧貞（民78）經Beck, Ward, Mendelson, Mock與Erbaugh（1961）同意，依據1978年版的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中文譯本修訂而成的「貝克氏憂鬱量表」來評量大學生的憂鬱傾向。依柯慧貞（民78）對國人所做的信、效度研究結果指出，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alpha$  值為.87；經斯布公式（Spearman-Brown Formula）校正後為.94；與臨床診斷之效度方面，也證實可以有效的區分重鬱症、輕鬱症以及非憂鬱組。此外，黃子恩（民81）以此量表，對中原大學215名學生施測，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得Cronbach  $\alpha$  值為.91，相隔三週之後重測信度值為.83。黃子恩並利用測量結果，經主軸法因素分析抽取共同因素及斜交轉軸法進行轉軸後，得到六個因素，每個項目之因素負荷量都在.474以上。

## 結 果

### 一、「研究一」：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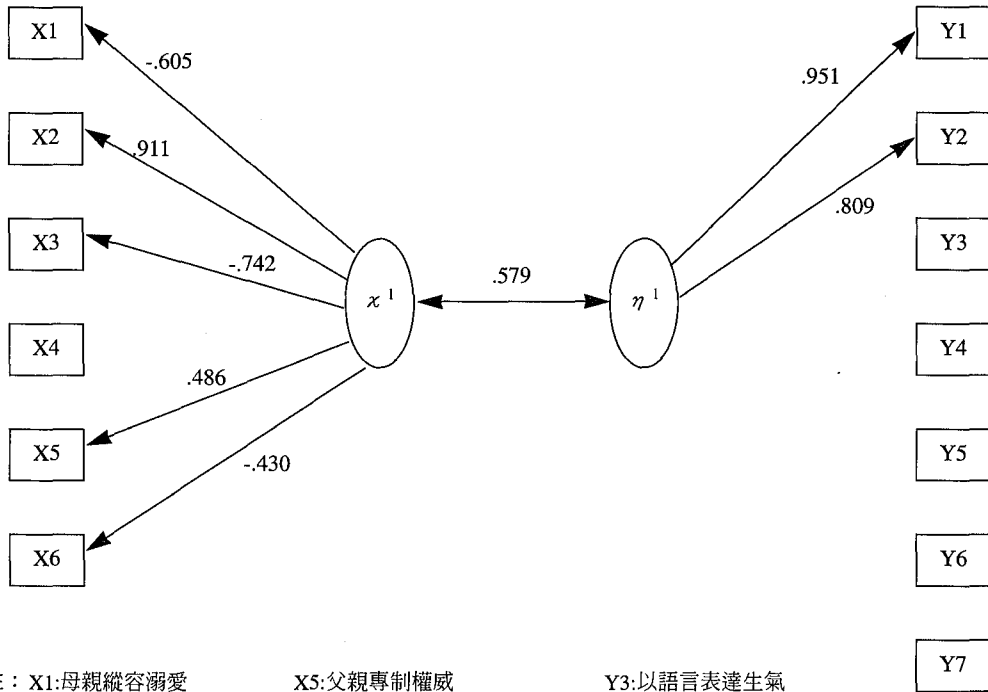
#### (一)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的關係

本節以典型相關統計法考驗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的關係，結果如表四，並將研究結果整理為「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的典型相關結構圖」（圖一）。

表四 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X變項	典 型 因 素 $\alpha^1$	Y變項	典 型 因 素 $\eta^1$
母親縱容溺愛 (X1)	-.605	生氣前置情境頻率 (Y1)	.951
母親專制權威 (X2)	.911	生氣激起狀態 (Y2)	.809
母親開明權威 (X3)	-.742	以語言表達生氣 (Y3)	.216
父親縱容溺愛 (X4)	-.284	以動作表達生氣 (Y4)	.247
父親專制權威 (X5)	.486	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 (Y5)	.107
父親開明權威 (X6)	-.430	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 (Y6)	.233
		控制生氣 (Y7)	-.113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375	抽出變異數百分比	.249
		重疊	.084
重疊	.126	$\rho^2$	.335
		典型相關係數 ( $\rho$ )	.579***

\*\*\* $p < .001$  N=359



註：X1:母親縱容溺愛	X5:父親專制權威	Y3:以語言表達生氣
X2:母親專制權威	X6:父親開明權威	Y4:以動作表達生氣
X3:母親開明權威	Y1:生氣前置情境頻率	Y5: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
X4:父親縱容溺愛	Y2:生氣激起狀態	Y6: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
		Y7:控制生氣

圖一 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的典型相關結構圖

註：此結構圖所保留為典型因素負荷量 > .3 者；“+、-”表示關係的方向性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之間有典型相關存在。由表四可知，其典型相關係數  $\rho$  為 .579 ( $P < .001$ )，其決定係數 ( $\rho^2$ ) 為 .335，表示在 X 組變項的第一個典型因素 ( $\chi^1$ ) 可以解釋 Y 組變項之第一個典型因素 ( $\eta^1$ ) 總變異量的 33.5%。 $\chi^1$  是從 X 組六個變項中抽取出來的第一個典型因素，佔 X 組變項總變異量的 37.5%；X 組變項與 Y 組第一個典型因素 ( $\eta^1$ ) 重疊部分為 .126，表示 Y 組第一個典型因素 ( $\eta^1$ ) 可以解釋 X 組變項總變異的 12.6%。 $\eta^1$  是從 Y 組七個變項中抽取出來的第一個典型因素，佔 Y 組變項總變異量的 24.9%，Y 組變項與 X 組第一個典型因素 ( $\chi^1$ ) 重疊部分為 .084，表示 X 組變項第一個典型因素 ( $\chi^1$ ) 可以解釋 Y 組變項總變異的 8.4%。

(二) 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對大學生憂鬱傾向的預測

本節以同時多元迴歸分析來探討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對大學生憂鬱傾向的預測情形。其結果如下表五、表六。



表五 「母親縱容溺愛、母親專制權威、母親開明權威、父親縱容溺愛、父親專制權威、父親開明權威」預測「憂鬱傾向」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迴歸	1606.272	6	267.712	4.312***
殘差	21917.184	353	62.088	
全體	23523.456	359		

\*\*\*p<.001 N=359

表六 「母親縱容溺愛、母親專制權威、母親開明權威、父親縱容溺愛、父親專制權威、父親開明權威」預測「憂鬱傾向」之多元迴歸係數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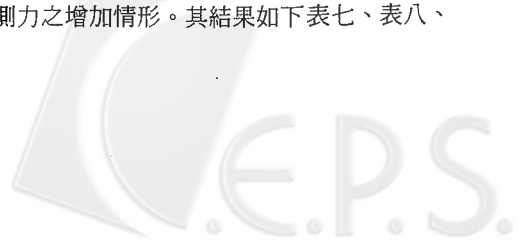
預測變項	原始分數		標準化		R	R <sup>2</sup>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	迴歸係數 (β)	t 值		
(截距)	90.16	5.311				
母親縱容溺愛	.261	.121	.156	1.698		
母親專制權威	.270	.097	.217	2.159*		
母親開明權威	.000	.078	-.086	2.795**		
父親縱容溺愛	-.234	.112	-.153	-1.272		
父親專制權威	.000	.090	-.028	-2.099		
父親開明權威	.000	.080	-.057	-.806		
					.261	.068

\*p<.05 \*\* p<.01 N=359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的憂鬱傾向。由表五及表六可知，母親縱容溺愛、母親專制權威、母親開明權威、父親縱容溺愛、父親專制權威、父親開明權威六個變項對憂鬱傾向的預測達顯著水準 (F= 4.312, p<.001)；表示大學生所知覺的父母權威性之六個因素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其多元相關係數 R=.261，代表預測分數與實際分數之相關為.261，其決定係數 (R<sup>2</sup>) 為.068，表示六個預測變項可解釋憂鬱傾向變異量的 6.8%。父母權威性的六個因素中，「母親縱容溺愛」、「母親專制權威」、「父親縱容溺愛」對憂鬱傾向預測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的 t 值達顯著水準，分別為.156 (p<.05) 和.217 (p<.01) 和-.153 (p<.05)，表示此三係數有顯著意義，其中「母親專制權威」的預測力最高。這表示，當其它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大學生知覺的「母親專制權威」、「母親縱容溺愛」分數愈高時，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分數也愈高；而其它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時，大學生知覺的「父親縱容溺愛」分數愈高，則大學生憂鬱傾向分數愈低。

### (三)大學生生氣歷程對大學生憂鬱傾向的預測

本節以多元同時迴歸分析來探討大學生生氣歷程對大學生憂鬱傾向的預測情形，及大學生生氣表達方式對大學生憂鬱傾向的預測情形，並以階層式多元迴歸分析來探討在生氣表達方式之外，加上「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對憂鬱傾向的預測力之增加情形。其結果如下表七、表八、表九、表十、表十一所示。



## 1.大學生生氣歷程對大學生憂鬱傾向的預測情形

表七 「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控制生氣」預測「憂鬱傾向」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 S	df	MS	F
迴歸	3704.844	7	529.263	9.400***
殘差	19818.612	352	56.303	
全體	23523.456	359		

\*\*\*p&lt;.001 N=359

表八 「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控制生氣」預測「憂鬱傾向」之多元迴歸係數表

預測變項	原始分數		標準化		R	R <sup>2</sup>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	迴歸係數 ( $\beta$ )	t值		
(截距)	2.099	2.540		.826		
生氣前置情境頻率	1.202	.307	.290	3.916***		
生氣激起狀態	.000	.015	-.011	-.137		
VO	-.357	.146	-.131	-2.453*		
AO	.526	.196	.147	2.689**		
IO	-.173	.175	-.056	-.989		
AI	.520	.152	.192	3.431**		
CO	-.203	.140	-.081	-1.451		
					.397	
						.157

\*p&lt;.05 \*\*p&lt;.01 \*\*\*p&lt;.001 N=359

註：VO表示「以語言表達生氣」。AO表示「以動作表達生氣」。IO表示「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AI表示「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CO表示「控制生氣」。

由表七及表八可知，「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控制生氣」七個預測變項對「憂鬱傾向」的預測達顯著水準 ( $F=9.400$ ,  $p<.001$ )，表示生氣歷程的七個變項可以有效預測憂鬱傾向。其多元相關係數 $R=.397$ ，代表預測分數與實際分數之相關為.397，其決定係數 ( $R^2$ ) 為.157，即七個預測變項可以解釋憂鬱傾向變異量的15.7%。生氣歷程七個變項中，「生氣前置情境頻率」、「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對憂鬱傾向預測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 $\beta$ ) 的t值達顯著水準，分別為.290 ( $p<.001$ )、-.131 ( $p<.05$ )、.147 ( $p<.01$ )、.192 ( $p<.01$ )，表示此四個係數有顯著意義。其中「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的預測力最高，次為「以動作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這表示，當其它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大學生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以動作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分數愈高時，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分數也愈高。而「以語言表達生氣」對憂鬱傾向預測之標準化迴歸係數是負的，表示當其它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時，大學生的「以語言表達生氣」分數愈高，則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分數愈低。

## 2. 大學生生氣表達方式對大學生憂鬱傾向的預測情形

表九 「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控制生氣」預測「憂鬱傾向」之多元迴歸變異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迴歸	2025.785	5	405.157	6.672***
殘差	21497.670	354	60.728	
全體	23523.456	359		

\*\*\* $p < .001$  N=359

表十 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控制生氣」預測「憂鬱傾向」之多元迴歸係數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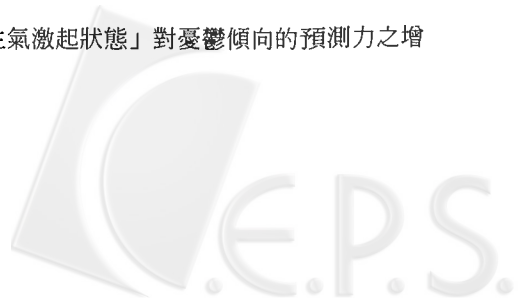
預測變項	原始分數		標準化		R	R <sup>2</sup>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	迴歸係數 ( $\beta$ )	t 值		
(截距)	5.352	2.391	2.239*			
VO	-.227	.146	-.083	-1.555		
AO	.625	.202	.175	3.102**		
IO	.000	.174	-.013	-.232		
AI	.637	.151	.235	4.230***		
CO	-.191	.138	-.076	-1.386	.293	.086

\* $p < .05$  \*\* $p < .01$  \*\*\* $p < .001$  N=359

註：VO 表示「以語言表達生氣」。AO 表示「以動作表達生氣」。IO 表示「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AI 表示「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CO 表示「控制生氣」。

由表九及表十可知，「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控制生氣」五個預測變項對「憂鬱傾向」的預測達顯著水準 ( $F=6.672$ ,  $P < .001$ )，表示生氣表達方式的五個因素可以有效預測憂鬱傾向。其多元相關係數  $R=.293$ ，代表預測分數與實際分數之相關為 .293，其決定係數 ( $R^2$ ) 為 .086，即五個預測變項可以解釋憂鬱傾向變異量的 8.6%。生氣表達方式五個因素中，「以動作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對憂鬱傾向預測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 $\beta$ ) 的 t 值達統計顯著水準，分別為 .175 ( $p < .01$ ) 和 .235 ( $p < .001$ )，表示此兩個係數有意義，其中「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的預測力最高。這表示當其它的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時，大學生「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以動作表達生氣」的分數愈高時，則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分數也愈高。

3. 生氣表達方式之外，加上「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對憂鬱傾向的預測力之增加情形



表十一 階層式多元迴歸模式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R <sup>2</sup> Change
子組 (Subset) : VO,AO,IO, AI,CO	1553.564	5	310.713	5.519***	.066
測試組 (Tests) : 生氣前置情境頻率, 生氣激起狀態	1679.058	2	839.529	14.911***	.071
迴歸	3704.844	7	529.263	9.400***	
殘差	19818.612	352	56.303		
全體	23523.456	359			

\*\*\*p&lt;.001 N=359

註：VO表示「以語言表達生氣」。AO表示「以動作表達生氣」。

IO表示「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AI表示「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

CO表示「控制生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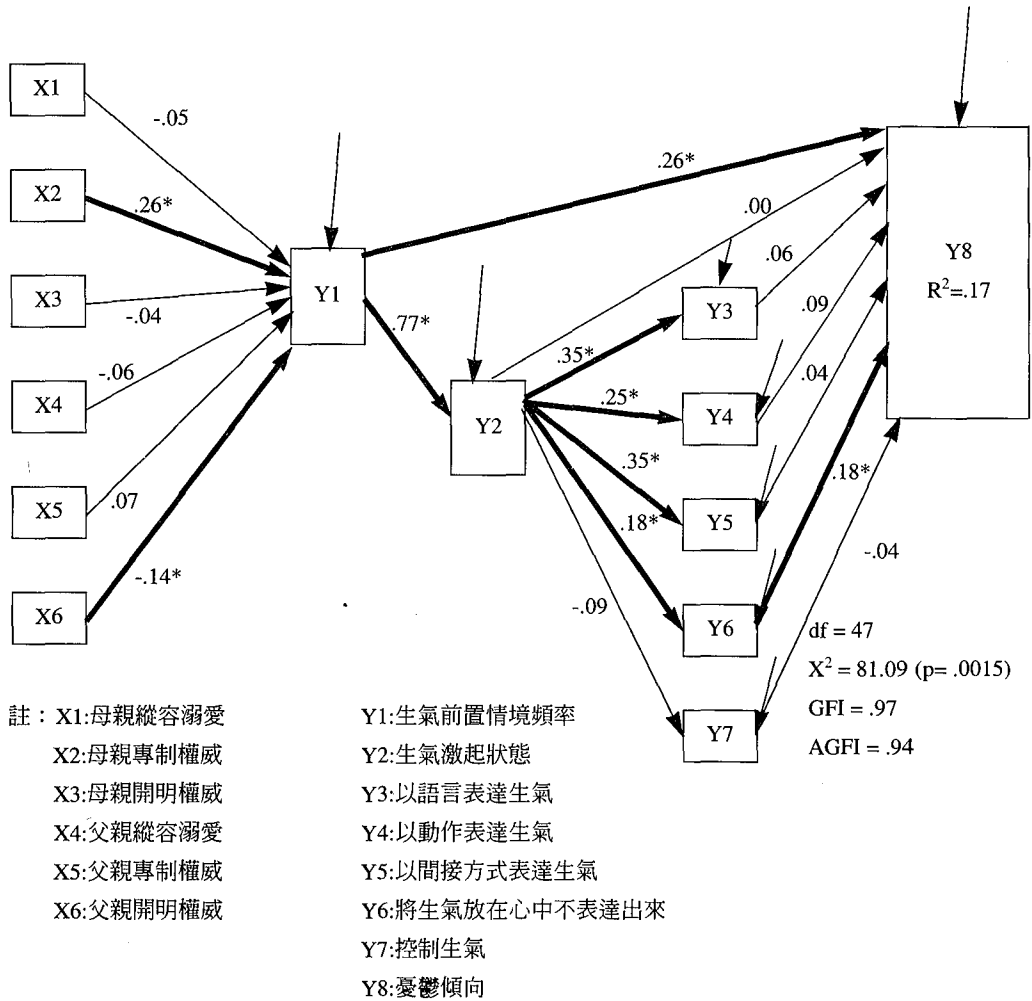
由表十一可知，排除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的影響以後，「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控制生氣」為預測變項，可以有效預測憂鬱傾向 ( $F = 5.519, P < .001$ )，其獨自對憂鬱傾向預測的變異量為6.6%。而在排除五種生氣表達方式之影響後，以「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為預測變項時，可以有效預測「憂鬱傾向」( $F = 14.911, P < .001$ )，其獨自對憂鬱傾向預測的變異量為7.1%。表示在五種生氣表達方式之外，外加「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可以顯著增加對憂鬱傾向的預測力。

## 二、「研究二」：大學生知覺父母權威性與其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徑路模式

本節探討研究者所提出的徑路模式是否適合說明本研究實際所收集的資料，以徑路模式之適合度考驗，比較此限制模式是否符合充足模式。結果得  $\chi^2$  為 81.09 ( $p = .0015$ )，適配性指數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為 .97，調整後的適配性指數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為 .94。雖然研究者所提出的限制模式未能和充足模式完全符合，但從適配性指數為 .97，調整後的適配性指數為 .94 來看，已經接近良好適配的程度。亦即，此限制模式可以被接受用來說明本研究的變項之間的關係，如圖二所示。

由圖二可以看出，父母權威性中，主要是「母親專制權威」、「父親開明權威」對大學生生氣前置情境頻率較具影響力，其徑路係數分別為 .26 ( $p < .05$ ) 和 -.14 ( $p < .05$ )，達到 .05 顯著水準。其中，「母親專制權威」對大學生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的影響是正向的，「父親開明權威」對大學生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的影響是負向的。在大學生生氣歷程中，「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直接影響「憂鬱傾向」，其徑路係數為 .26 ( $p < .05$ )，達顯著水準。此外，「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直接影響「生氣激起狀態」，徑路係數高達 .77 ( $p < .05$ )。「生氣激起狀態」並未直接影響「憂鬱傾向」，徑路係數為 .00 ( $p > .05$ )。「生氣激起狀態」對五種生氣表達方式中的「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較具有影響力，徑路係數各為 .35 ( $p < .05$ )，.25 ( $p < .05$ )，.35 ( $p < .05$ )，.18 ( $p < .05$ )，均達 .05 顯著水準。「生氣激起狀態」對「控制生氣」的影響則未達顯著水準，徑路係數為 -.09 ( $p > .05$ )。五種生氣表達方式中，僅「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





圖二 大學生知覺父母權威性與其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徑路模式

對憂鬱傾向的影響達顯著水準，其徑路係數為.18 (p<.05)。圖二也顯示，整體而言，本研究所提出的徑路模式中，各預測變項可以解釋憂鬱傾向總變異量的17%。

### 討 論

#### 一、「研究一」：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間的關係

##### (一)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圖一之典型相關結構顯示，大學生知覺母親愈傾向專制權威、父親愈傾向專制權威，而且母親愈不傾向縱容溺愛和愈不開明權威及父親愈不開明權威時，則大學生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和生氣激起狀態會愈高。本研究結果和過去研究的發現頗為類似，李雪禎 (民85)、Metcalf與Gaier (1987)、Loose與Alexander (1997) 等人的研究皆發現，父母採專制權威、高壓管教、嚴厲紀律等管教方式時，子女有較多的生氣情緒。李雪禎 (民85)、Markosian (1996) 等人的研究也發現父母採開

明權威時，子女較不會經歷到生氣情緒。

由本研究結果可看出，父母如果常持絕對的單一標準來要求子女，講究完全服從勝於意見溝通的專制權威管教方式時，將使得大學生置身於這些容易引起生氣的情境之頻率大大提高，大學生也常常感到生氣並且在生氣的強度和持續度上都較強。但如果父母是用引導和講解理由的開明權威方式來要求大學生子女，則大學生生氣情境的發生頻率將較低，大學生生氣激起的狀態也比較低。此外，大學生知覺其母親愈縱容溺愛，則在生氣情境頻率和生氣激起狀態上也較低。

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的五種生氣表達方式和其知覺的父母權威性沒有相關，這似乎和學者們的主張不太一致。例如，Teyber (1997) 認為，成長於父母專制權威下的子女，會將對父母的生氣指向自己，採取向內生氣的表達方式。Maccoby 與 Martin (1983) 則注意到成長於父母專制權威下的小孩，有些在情緒及行為表達上是壓抑的 (subdued)，有些則是失控的 (out of control)。由於過去的實徵研究通常是探討父母的管教方式和子女的生氣體驗 (如「特質生氣」或生氣的頻率、強度) 的關係 (李雪禎, 民 85; Loose & Alexander, 1997; Markosian, 1996; Metcalf & Gaier, 1987)，較缺乏探討父母的權威或教養態度等和子女生氣表達的關係；因此，過去研究似乎揭示子女會不會生氣以及生氣的多寡可能和父母的權威性有關，但會以何種方式來表達生氣卻是目前實徵研究較缺乏探討的。再者，可能因為過去的研究並未以「生氣歷程」的概念 (也就是同時考慮生氣的前置情境和頻率、生氣激起的狀態以及生氣表達方式) 來進行和父母權威性的相關探討，一旦以「生氣歷程」的概念來探討之後，就發現似乎子女的「生氣表達方式」不如子女的「生氣情境頻率」和「激起狀態」和父母權威性的相關來得凸顯。今後的研究或許可以針對此，探討若分別以「生氣歷程」的概念和只考慮「生氣表達」方式來探討和父母權威性的相關時，其關係組型各如何。

#### (一) 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對大學生憂鬱傾向的預測

本研究結果說明了，大學生知覺其母親愈傾向於採取單一標準的要求、不允許其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見、限制其自主性，並且要求絕對服從，否則就予以懲罰的專制權威方式時，則大學生的憂鬱傾向也愈高。這和過去的研究結果頗為一致：李雪禎 (民 85)、Oliver 與 Paul (1991)、Fox、Bronstein 與 Knolls (1997)、Straus 與 Donnelly (1994)、Curtner (1995) 等人的研究皆發現，青少年知覺父母行為愈是高要求的、控制的、專制的、懲罰的，則其憂鬱程度愈高。

此外，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大學生知覺母親愈縱容溺愛，則愈容易有憂鬱傾向。然而，大學生知覺父親愈縱容溺愛，則愈不會有憂鬱傾向。這樣的不一致結果，在過去的文獻上也有類似的發現：Raskin、Boothe、Reating、Schulterbrandt 與 Odel (1971) 針對憂鬱症患者的研究發現，這些患者知覺其母親 (而不是父親) 是「過度縱容」(overpermissive) 的；然而，Parker (1979, 1981, 1982) 的研究結果卻發現憂鬱者的母親常是「過度保護」的。針對此不一致的結果，研究者認為有幾點值得討論：

1. 子女知覺母親的縱容和不要求為「不管」、「不愛」。這或許和中國傳統文化視父母的要求與權威控制為天經地義 (余德慧, 民 76)，甚至是一種表達「愛」的方式有關。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受到父母的要求、期望與控制，背後可能意味著「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殷切盼望，對子女而言，也可能成了一種感受父母的愛之方式；父母的管束與要求，成了「愛」的象徵。過去的一些研究也有類似的意涵：張老師中心的調查發現，當父母不給予要求時，67% 的子女心中並不快樂 (余德慧, 民 76)。吳麗娟 (民 86) 也發現，國中青少年似乎視服從父母的「管」與要求為「本來就應該」的事情，父母一旦「不管」了，青少年可能反而覺得父母不關心、不愛他。歐陽儀 (民 87) 的研究也指出，母親愈不給予控制和規範、愈給予心理自主時，則子女與母親的依附關係愈疏離；似乎母親的要求與約束在子女心中等同於關愛和重視，當子女不被要求與規範管束時，反而感到和母親之間的情感連結較疏離。

2.「縱容溺愛」的管教方式，對成長於我國文化下的子女而言，可能有著和國外文化不一樣的意涵。尤其，傳統上母親常被期待負責張羅家庭事務和處理子女的事情，和子女相處的時間可能也多於父親，因此，母親對子女的管束和要求可能更被視為是「應該的」，所以當大學生知覺其母親愈縱容溺愛、愈少感到母親對他的要求和期待時，可能也意味著在高度的自由自主和少被要求之下，較感受不到被母親所重視和關心，因而容易覺得不被愛、不被在乎，甚至在情緒上覺得孤單寂寞，而容易有憂鬱傾向。

3.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知覺父親愈縱容溺愛，則愈不會有憂鬱傾向，但大學生知覺母親愈縱容溺愛，則愈容易有憂鬱傾向，這或許是因為在我國傳統父權社會下，父親的縱容可能和以往父權的嚴肅權威形象成了對比，反而可能被子女知覺為權威管束的鬆綁，然而，在傳統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務分工期許上，母親常被期待處理及管教子女的日常生活事物，子女有可能知覺母親的不給予要求和管束之縱容為漠不關心。然而，針對以上的討論及可能的解釋，尚需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

### (三)大學生生氣歷程對大學生憂鬱傾向的預測

本研究之結果顯示，大學生生氣歷程可以有效預測其憂鬱傾向、大學生生氣表達方式可以有效預測其憂鬱傾向，且生氣表達方式之外，加上「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可以顯著增加對憂鬱傾向的預測力。

本研究以生氣歷程預測憂鬱傾向時，顯示大學生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愈高、愈常以動作表達生氣、愈常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則愈容易有憂鬱傾向；但如果愈常以語言表達生氣則憂鬱傾向愈低。在只以生氣表達方式來預測憂鬱傾向時，則顯示大學生愈常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或是愈常以動作表達生氣則其憂鬱傾向愈高。過去研究也有類似發現：Biaggio與Godwin（1987），Clay、Anderson與Dixon（1993），Moore與Paolillo（1984），以及Riley、Treiber與Woods（1989）等人都曾發現，愈常向內生氣，則憂鬱程度也愈高。本研究則發現「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對憂鬱傾向有正向預測力，由於「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可視為「向內表達生氣」（李瑞玲，民82；許靜怡，民85），所以可以說本研究結果和過去研究結果類似。然而，「以動作表達生氣」和「以語言表達生氣」雖然同樣可以歸為「向外表達生氣」（李瑞玲，民82；許靜怡，民85），但本研究結果卻發現兩者對憂鬱的預測方向剛好相反：愈常以動作表達生氣則愈容易有憂鬱傾向，而愈常以語言表達生氣則愈不會有憂鬱傾向；這似乎存有矛盾，然而過去研究也有此種不一致的發現，例如：Johnson與Broman（1987）曾發現向外表達生氣和健康狀況有負相關，但Thomas與Williams（1990）則發現「討論生氣」（anger-discuss）有助於提升健康水準。Riley與Treiber（1989）認為「生氣討論」是屬於口語的適應性生氣表達（引自Thomas & Williams, 1990），本研究的「以語言表達生氣」似乎與Thomas與Williams（1990）研究的「生氣討論」具類似意涵，同屬口語的適應性生氣表達。

雖然早期心理分析學者認為，長期向內生氣、將生氣導向自己或壓抑生氣是導致憂鬱症的原因之一（Alexander & French, 1948；Freud, 1917, 1957；引自Clay, Anderson & Dixon, 1993），但是，向外表達生氣是否就不會造成憂鬱傾向，卻是有待進一步探討的。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愈常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或愈常以動作表達生氣，則可能愈不利於心理健康，長期的結果可能容易有憂鬱傾向；然而，若大學生採取以語言來表達生氣的方式，則較有利於心理健康，而較不會有憂鬱傾向。由此可見，生氣表達方式與憂鬱的關係，似乎並不像以往心理分析學者所認為的單純；「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向內生氣）固然可能造成憂鬱傾向，然而「以動作表達生氣」（向外生氣）也可能造成憂鬱傾向。

此外，本研究結果更發現「生氣情境頻率」在預測憂鬱傾向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生氣歷程七個預測變項中，以「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對憂鬱傾向的預測力最高，然而「生氣激起狀態」對憂鬱的預測並沒有達到顯著。本研究之生氣激起狀態是指長期累積的生氣激起，和「特質生氣」的概念類似

(李瑞玲, 民82)。過去Thomas與Williams (1990)的研究也發現,「特質生氣」並無法預測健康水準;生氣激起的一般傾向(特質生氣)對健康而言,似乎並沒有像受到壓力事件或其他的前置因素激發後所選擇使用的生氣表達方式來得重要。這和本研究以生氣歷程的概念預測憂鬱傾向的發現一致,即「生氣前置情境頻率」、「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對憂鬱傾向的預測達到顯著水準,但「生氣激起狀態」對憂鬱傾向的預測則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由於過去有關生氣和憂鬱的研究結果不盡一致,李瑞玲(民82)指出生氣對心理健康因子的影響之所以不易獲得較一致的結果,乃是因大部分的研究偏於探討生氣表達方式(向外、向內生氣)與心理健康的關係,而忽略了生氣前置情境在個體生活中所發生的頻率或生氣激起狀態等因素對心理健康可能的影響。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在五種生氣表達方式之外,加上「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和「生氣激起狀態」的確可以顯著增加對憂鬱傾向的預測力。這說明了,在探討生氣和憂鬱的關係時,若能同時考慮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和生氣表達方式,將比只考慮生氣表達方式來得具有預測力。亦即,以「生氣歷程」的概念來探討生氣和心理健康的關係,將比只考慮生氣的單一層面具有效力;本研究結果也突顯了「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在憂鬱傾向成因上的重要性,且單以向外和向內表達生氣來預測憂鬱並不能夠完整地看出生氣表達與心理健康的關係。

## 二、「研究二」：大學生知覺父母權威性與其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徑路模式

圖二之徑路模型揭示了重要的影響途徑：大學生知覺的「母親專制權威」直接影響「生氣前置情境頻率」間接影響「憂鬱傾向」。另一路徑是,大學生知覺的「母親專制權威」透過「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然後經由「生氣激起狀態」,再經由「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來影響「憂鬱傾向」。本研究所發現的這些間接影響徑路和Teyber (1997)的看法一致。Teyber認為,處於父母的專制權威之下,子女在開始時可能會對此感到生氣,想要抗議,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可能受到父母更多的處罰或威脅,甚至以撤回關愛或引發罪惡感的方式來懲罰子女。因此,子女無法對父母抗議或生氣,甚至連在心裡都不敢去承認或體驗對父母的生氣。長期下來,子女會將原本對父母的生氣指向自己,透過自貶、自責、自我批評、自我輕蔑等方式來對待自己,並且容易有憂鬱症狀。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知覺的母親專制權威直接影響「父母亂批評我」生氣前置情境在大學生生活中發生的頻率,進而使大學生容易有憂鬱傾向。圖二也顯示「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在對憂鬱傾向的影響上乃是所有預測變項中最具影響力者。這似乎更呼應了Teyber (1997)由臨床個案所注意到的,面對專制權威的父母,子女甚至是不敢去經驗對父母的生氣的,在意識上可能沒有體驗到對父母的生氣或不敢去承認對父母生氣。吳麗娟(民86)也指出,情緒沒有表達並不代表沒有情緒。本研究發現,即使沒有經過生氣激起和生氣表達的過程,然而,母親的專制權威使得子女常常處於這樣的生氣前置情境下,就容易使大學生有憂鬱傾向了。此外,本節的徑路模式結果和前一節「研究一」的結果,再再顯示了「生氣前置情境頻率」變項的重要性。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和憂鬱傾向的關係及其影響是否如同學者(Thomas & Williams, 1990)所認為的,和「壓力」的概念類似,因而和心理健康有密切關係,是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的。

本研究結果也說明,母親的專制權威將使大學生「有機會生氣」的頻率提高,高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容易使子女有較高的實際生氣頻率、強度、持續度等,而高的生氣激起狀態如果是透過「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的向內生氣的方式,則容易有憂鬱傾向,但如果是採取其他的生氣表達方式則和憂鬱傾向較無關。此似乎意味了,母親的專制權威常使子女處於高生氣的情境頻率和高的生氣激起狀態下,但這些被激起的生氣情緒若沒有適當的出口,而壓抑在心中,那麼子女就容易有憂鬱傾向的危險了。

本研究也發現,大學生知覺的「父親開明權威」愈高,則生氣前置情境頻率愈低,愈不會有憂鬱

傾向。另一影響途徑是，大學生知覺的「父親開明權威」愈高，則生氣前置情境頻率愈低，生氣激起狀態愈低，愈不會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愈不會有憂鬱傾向。亦即，如果父親能採開明權威的管教態度，用引導和講解理由的方式來要求子女，讓子女知道父親的要求與控制背後的原因，並且鼓勵彼此的意見溝通和子女的自主性，那麼將使大學生生氣情境發生的頻率較低，大學生也較不會有憂鬱傾向；即使大學生有生氣激起，也較不會用「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的方式來處理情緒，因而也較不會有憂鬱傾向。

此外，本研究之徑路模式也說明了「生氣歷程」的七個變項在做為父母權威性和憂鬱傾向之間的中介角色之重要性。「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直接影響憂鬱傾向，或是透過「生氣激起狀態」，再經由生氣表達方式中的「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來影響憂鬱傾向；「生氣激起狀態」並不直接影響憂鬱傾向，而是透過生氣表達方式。此說明了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和生氣表達方式在個體心理健康上的重要性。再者，本研究之徑路模型另揭示一要點：五種生氣表達方式的殘餘誤差之間存在著相關，且多數達顯著水準，如下表十二所示：

表十二 五種生氣表達方式殘餘誤差之相關矩陣 (PSI)

	(VO)	(AO)	(IO)	(AI)	(CO)
以語言表達生氣 (VO)					
以動作表達生氣 (AO)	.15*				
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 (IO)	-.05	.11*			
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 (AI)	-.23*	-.01	.16*		
控制生氣 (CO)	-.16*	-.17*	-.08	.33*	

\* $p < .05$

上表十二顯示出，當用「生氣激起狀態」來預測五種生氣表達方式時，其殘餘誤差之間仍存在著相關。這說明了五種生氣表達方式之間可能是成群出現的，而不是單一表達，而且由殘餘誤差之間的相關係數大小及方向性也可約略看出「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和「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通常是一起發生的；「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與「控制生氣」則較常一起發生。這意味了個體的生氣表達方式可能是多重的，而不是通常只使用一種表達方式。此點似乎隱含了額外的積極意義：個體如果能學習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並且能因時因地制宜地善加運用，將是較為有利的。另外，由於前述的研究結果及討論已指出「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直接影響憂鬱傾向；因此不僅是善用多元化的生氣表達，最重要的是應避免使用「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的方式，更不要只是僵化於此一表達，否則將不利於心理健康。

整體而言，本研究之徑路模型強調父母權威性透過各生氣變項對憂鬱傾向的間接影響途徑，研究者認為本研究之徑路模型可以歸納出兩大重點，並且可以做為親職教育和情緒教育上的著力點。茲說明如下：

(一)從圖二徑路模式的左半部觀之，大學生知覺的「母親專制權威」和「父親開明權威」直接影響了大學生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這意味著實際情況中，母親如果愈專制權威則將使子女（大學生）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提高，而且高頻率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將直接影響大學生的憂鬱傾向。父親如果常採開明權威的方式，則將減低大學生生氣前置情境頻率，進而減低憂鬱傾向。此點在親職教育上說明了：父母親（尤其是母親）應該盡量避免採用專制權威的方式對待子女，否則將使子女置身於生氣前置情境的頻率提高，而且即使子女沒有經過生氣的激起和表達過程，單是高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似乎就足以提高子女的憂鬱傾向了。父母親（尤其是父親）如果可以採用開明權威的方式，則可以減少

子女置身於生氣前置情境的頻率，進而減少憂鬱的可能性。

(二)從圖二徑路模式的右半部觀之，「生氣前置情境頻率」透過「生氣激起狀態」，再經由「生氣表達方式」來影響「憂鬱傾向」。生氣前置情境在個體的生活中發生的頻率愈高，則個體的生氣激起狀態也愈高，且愈容易採取「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的方式來表達生氣；如果個體愈常使用「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的方式，則愈容易有憂鬱傾向，若使用其它的表達方式則和憂鬱傾向無關。這意味了，即使個體經常處於高頻率的生氣前置情境中，且有高的生氣激起狀態，但如果個體可以採取「以語言表達生氣」、「以動作表達生氣」和「以間接方式表達生氣」的方式仍然可以避免造成憂鬱傾向；但是如果個體是採取「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的方式，則容易導致憂鬱傾向。這反映出了個人的生氣表達方式在心理健康上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即使個體經常處於生氣的前置情境頻率中，但如果能有其它的生氣表達方式，而不將生氣鬱積在心中沒有表達出來，則仍然可以避免憂鬱傾向。這一點說明了，在個人的情緒教育上，應鼓勵個體學習多樣化的生氣表達方式，避免將生氣悶在心中，擴充生氣表達方式的種類及彈性，讓生氣得以有適當的抒發管道，以免對心理健康造成不利的影響。

綜上可知，雖然本研究所提出的徑路模型對憂鬱傾向的影響之解釋效力不高（17%），但父母權威性經由生氣歷程各變項對憂鬱傾向的間接影響途徑確實是存在的；儘管總體影響的效力不大，但卻不容忽視。

### 三、「研究一」、「研究二」綜合討論

「研究一」和「研究二」的結果共同顯示了以下內涵：

(一)專制權威的教養方式較不利於子女的情緒體驗及表達，也較不利於子女的心理健康，尤以母親專制權威的不良影響為重。本研究兩個子研究共同顯示，大學生知覺母親愈專制權威，則大學生愈容易處於生氣情境及生氣狀態中，也愈容易有憂鬱傾向。「研究一」則顯示大學生知覺父親愈專制權威，則愈常處於生氣的前置情境中，也有較高的生氣激起狀態。

(二)開明權威的教養方式較有利於子女的情緒體驗及表達，也較有利於子女的心理健康，尤以父親開明權威的有利影響為重。本研究之「研究二」顯示，大學生知覺父親愈開明權威，則大學生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愈低，愈不會有憂鬱傾向；此外，大學生知覺父親愈開明權威，則愈不會處於生氣的前置情境中，生氣激起狀態也愈低，且也愈不會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愈不會有憂鬱傾向。「研究一」也顯示，大學生知覺父親愈開明權威或母親愈開明權威，則愈不會處於生氣的前置情境中，生氣激起的狀態也較低。

(三)縱容溺愛的教養方式使子女較不會處於生氣情境及生氣狀態中，但對子女心理健康的影響卻可能因雙親而有不同。本研究之「研究一」顯示，大學生知覺母親愈縱容溺愛，生氣前置情境頻率愈低、生氣激起狀態也愈低。然而，大學生知覺母親愈縱容溺愛，則其憂鬱傾向愈高，但大學生知覺父親愈縱容溺愛，則憂鬱傾向卻愈低。這顯示父、母的縱容溺愛和大學生的憂鬱傾向關係並不一致，有待更進一步研究的探討。此項研究結果是否和我國特殊的文化背景有關，是否可能因在傳統父權社會下，子女將父親的縱容知覺為嚴肅權威的鬆綁或慈愛，而將母親的縱容解讀為不夠在乎與關心，是有待後續研究探討的。然而，此不一致結果，或許意涵了父親在對孩子表達慈愛上有事半功倍之效。

(四)適度的要求與控制並尊重子女自主性的「開明權威」，似乎是父母在運用其管教權威時較適宜的方式。本研究在「研究一」和「研究二」的結果顯示：過度要求與嚴厲控制的專制權威，或不給予要求與控制、任其隨心所欲的縱容溺愛，皆可能對子女的情緒經驗和心理健康產生不利影響；而適度要求和控制，在明訂規範與堅定切實執行的同時，也讓子女擁有自主性的「開明權威」似乎較為有利。這似乎意味，父母對子女不是不能有權威控制，也不是不能給予要求和規範，而是要在一個適

度、合理的範圍內。因此，父母在對子女執行堅定控制與要求時，若能同時尊重子女的自主性和心理需求，將是較合宜的。吳麗娟（民86）即認為，最有效的教養態度是透過和子女溝通後訂定規範，然後切實實施（set rules firmly），並且以溫暖關愛的態度來執行（do it in a caring way）。本研究的結果似乎也與吳麗娟（民86）的看法一致。

(五)生氣歷程在父母權威性和憂鬱傾向之間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並且和心理健康的關係密切，尤其是「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和「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兩變項更是舉足輕重。

## 結 論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對大台北地區九所公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之大一到大三學生進行研究。主要有下列研究結果：1.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與大學生生氣歷程之間有典型相關存在。其關係組型為：「母親專制權威」、「父親專制權威」與「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為正相關；「母親縱容溺愛」、「母親開明權威」、「父親開明權威」與「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為負相關，其關係型態為反方向。2.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的憂鬱傾向。當其它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大學生知覺的「母親專制權威」、「母親縱容溺愛」分數愈高時，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分數也愈高；而其它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時，大學生知覺的「父親縱容溺愛」分數愈高，則大學生憂鬱傾向分數愈低。3.大學生的生氣歷程可以有效預測其憂鬱傾向：(1)以生氣歷程七個變項預測憂鬱傾向時發現，當其它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大學生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以動作表達生氣」、「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分數愈高時，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分數也愈高；而當其它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大學生的「以語言表達生氣」分數愈高，則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分數愈低。(2)以生氣表達方式五個變項預測憂鬱傾向時發現，當其它的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時，大學生「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以動作表達生氣」的分數愈高時，則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分數也愈高。(3)在生氣表達方式之外，加上「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對憂鬱傾向之預測力的增加部分顯示，在排除五種生氣表達方式的影響後，以「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生氣激起狀態」為預測變項時，可以顯著增加對憂鬱傾向的預測力。4.「大學生知覺父母權威性與其生氣歷程、憂鬱傾向之徑路模式」，可以被接受用來說明本研究各變項之間的關係：(1)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中，主要是「母親專制權威」對大學生生氣前置情境頻率會有正向影響，「父親開明權威」對大學生生氣前置情境頻率會有負向影響；父母權威性是直接影響大學生的「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再透過「生氣前置情境頻率」間接影響大學生的「憂鬱傾向」。除此之外，另一影響途徑是：大學生知覺的父母權威性直接影響「生氣前置情境頻率」，再透過「生氣激起狀態」，再經由「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間接來影響大學生的「憂鬱傾向」。(2)大學生的生氣歷程中，「生氣前置情境頻率」直接影響憂鬱傾向；或是經由「生氣激起狀態」，然後再透過「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來間接影響憂鬱傾向。生氣歷程中，「生氣激起狀態」並不直接影響憂鬱傾向，而是透過生氣表達方式中的「將生氣放在心中不表達出來」來間接影響憂鬱傾向。

## 參 考 文 獻

- 李雪禎（民85）：青少年的情緒經驗與父母教養方式之分析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瑞玲（民82）：以生物-心理-社會模式探討生氣歷程對血壓心理生理機制之影響。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余德慧 (民 76) : 中國人的父母經-黏結與親情。台北: 張老師出版社。
- 余德慧、林麗雲等 (民 80) : 中國人的新孝觀-親恩與回報。台北: 張老師出版社。
- 吳麗娟 (民 86) : 青少年心裡發展與適應之整合性研究-父母自我分化、教養態度對青少年子女自我分化、因應策略及適應影響之研究暨親職教育課程效果之實驗研究 (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 柯慧貞 (民 78) : 內因性與非內因性憂鬱症在腎上腺皮質素抑制反應、認知偏差及生活壓力上之比較。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許靜怡 (民 85) : 自尊、內外控、控制歷程與生氣表達之關係。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子恩 (民 81) : 憂鬱與非憂鬱傾向大學生之負向想法、轉移策略之比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歐陽儀 (民 87) : 教養方式與依附關係代間傳遞模式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Averill, J. R. (1982). *Anger and aggression: An essay on emotion*. New York: pringer-Baumrind, D. (1971).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4, 1-103
- Beck, A. T., Ward, C. H., Mendelson, M., Mock, J., & Erbaugh, J. (1961). An inventory for measuring depress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 462-467.
- Biaggio, M. K., & Godwin, W. H. (1987). Relation of depression to anger and ostility construct. *Psychological Reports*, 61, 87-90.
- Buri, J. R. (1991). Parental authority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7 (1),110-119.
- Burrowes, B. D., & Halberstadt, A. G. (1987). Self- and family- expressiveness styles in the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of anger.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11, 254-268.
- Clay, D. L., Anderson, W. P., & Dixon (1993). Relationship between anger expression and stress in predicting depress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2, 91-94.
- Corey, G. (1991).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4rd ed.). alifornia: Brooks/Cole.
- Curtner, M. E. (1995). Father's occupational conditions ,values of self-direction and conformity, and perceptions of nurturant and restrictive parenting in relation to young children's depression and aggression. *Family Relations*, 44 (3), 299-305.
- Fitz, D., & Gerstenzang, S. (1978). *Anger in every day life: When, where, and with whom?* St. Louis,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406021.
- Fox, B., Bronstein, P., & Knolls, M. V. (1997). Early family factors and self-silencing as predictors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study.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406021.
- Grusec, J. E. & Goodnow, J. J. (1994). Impact of parental discipline methods on the child's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current point of view.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0 (1), 4-19.
- Johnson, E. H., & Bronman, C. L. (1987). The relationship og anger expression to health problems among black Americans in a national survey. *Journal of Behavior Medicine*, 10, 103-116.
- Kessel, G., & Chrisler, J. C. (1991). *Self -destructive behavior in wom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Easter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New York.
- Lamont, J., & Gottlieb, H. (1975). Convergent recall of parental behaviors in depressed students of different racial group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2, 9-11.
- Loose, M. E., & Alexander, P. C. (1997). Differential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self-reported histories of abuse



- and neglect in a college sampl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2 (3), 340-360.
- Maccoby E. E., & Martin, J.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P. H. Mussen & M. E. Heatherington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Markosian, N. (1996). *Relationships among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bulimia,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and self-consciousness in late adolescence (eating disorder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AO AAC 9638995.
- Mckenzie, J. S. (1997).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giveness, anger, and depression with prisoners in a drug abuse treatment program*. University of Colorado. DAO AAC 9806130.
- Metcalf, K., & Gaier, E. L. (1987). Patterns of middle-class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underachievement. *Adolescence*, 22 (88), 919-928.
- Moore, T. W., & Paolillo, J. G. (1984). Depression: Influence of hopelessness, locus of control, hostility, and length of treatment. *Psychological Reports* 54, 875-881.
- Oliver, J. M. & Paull, J.C. (1991).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ptions of parenta rearing style and family climat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depress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39972.
- Parker, G. (1979). Parental characteristics in relation to depressive disorder.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4, 138-147.
- Parker, G. (1981). Parental reports of depressives: An investigation of several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 131-140.
- Parker, G. (1982). Parental representations and affective symptoms: Examination for a hereditary link.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55, 56-61.
- Raskin, A., Boothe, H. H., Reating, N.A., Schulterbrandt, J. G., & Odel, D. (1971). Factor analyses of normal and depressed patient's memories of parent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ports*, 29, 871-879.
- Rie, H. e. (1966). Depression in childhood: A survey of some pertinent contribu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5, 653-685.
- Riley, W. T., Treiber, A. & Woods, M. G. (1989). Anger and hostility in depression.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7, 668-674.
- Sharkin, B. S. (1988). The measurement and treatment of client anger in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6 (8), 361-365.
- Shaver, P., Schwartz, J., Kirson, D., & O'Conner, G. (1987). Emotion knowledg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a prototype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 229-250.
- Stehouwer, R. S., Bultsma, C. A., & Blackford, I. T. (1985).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Cognitive-perceptual distortion in adolescent versus adult female depressive. *Adolescence*, 20 (78), 291-299.
- Straus, M. A., & Donnelly, D. A. (1994). *Beating the devil out of the them: Corporal punishment in American Families*.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92541.
- Teyber, E (1997). *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psychotherapy: A relational approach* (3rd ed.).California: Brooks/Cole.
- Thomas, S. P., & Williams, R. L. (1990).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stress, trait anger, modes of anger expression and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men and wom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Society of

Behavioral Medicine Scientific Sessions, Chicago, IL. ED 326 808.

收稿日期：2000年3月24日

接受刊登日期：2000年11月12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1, 32(2), 19-44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Parental Authority, Anger Process and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SIU-LAN CHENG

SIEH-HWA LIN and LI-CHUAN WU

Ming-Tei Junior High Schoo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study consisted of two sub-studies. Study on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parental authority, anger process and de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tudy two tested the hypothesized path model of perceived parental authority, anger process and depression. The sample consisted of 765 students from nin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aipei area, and was randomly assigned to study one and study two. The research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Parental Authority Questionnaire", "Li Anger Process Questionnaire" and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Data obtained in study one were analyzed by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simultaneou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Data obtained in study two were analyzed by path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Individuals who perceived more maternal authoritarian, more paternal authoritarian, less maternal permissive, less maternal authoritative and less paternal authoritative experienced more anger antecedents and anger arousal. (2) While other variables were in control, individuals who perceived their mothers as more authoritarian or more permissive were likely to experience more depression. Whereas individuals who perceived their fathers as more permissive were less likely to experience depression. (3) Anger proces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depression. (4)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path analysis, the empirical data supported the hypothesized path model. The model could account for 17% of the total variance in depression.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parental authority, anger process, child-rearing style, depression

